

## 符指六要素视域下的五行灾异符号分析：以《汉书·五行志》为例

兰 兴

**摘 要：**五行灾异是中国古代符号学当中用来解释祥瑞异象的重要范式。作为天人感应中的重要媒介，五行灾异这套学说在长久的历史书写中得以保留与发展，其本源出自《汉书·五行志》。过往关于《汉书·五行志》的研究往往着力于其文献学等方面的价值，而对其在符号学研究上的潜力尚未充分挖掘，本文则试图在这个方面加以阐发。根据《汉书·五行志》四重层叠的文本结构特点，本文选择借助雅柯布森的符指六要素为理论工具对其四层文本逐一讨论，并分别确认其在建构五行灾异符号中的不同功能，从而更好地理解五行灾异符号系统的机制与功用。

**关键词：**五行，灾异，雅柯布森，汉代

## Semiotic Study of the Five Ph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man Jacobson's Model of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Lan Xing

**Abstract:** When we examine traditional semiotics in China, the *Five Phases* is a paradigm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sasters and portents. The paradigm that is believed to link Heaven and the human world has become a trad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writing. In retrospect, the *Treatise of the Five Phases* in *Han Shu* is the basic set of the paradigm. The text affords fruitful research space, but other studies focus mainly on examining its philological value and ignore its potential in semiotic study. Therefore, this study endeavours to fill this gap. Because the

text features a quadruple textual layer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this study uses Roman Jakobson's model of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which consists of six elements, as the main method. In discerning all four layers of the text, the study refers to Jakobson's model to identify the function of each layer. In doing so, this study better reveals the mechanism and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Keywords:** the *Five Phases*; abnormality; Roman Jakobson; the Han Dynasty

**DOI:** 10.13760/b.cnki.sam.202101008

在中国古代符号学思想中，五行灾异是极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简单来说，五行灾异可以被认为是天人感应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上天通过传递以五行为媒介的灾异现象，对统治者给予警示与劝诫。在正史当中，从《汉书》首创这一体裁之后，其间虽偶有中断，但《五行志》连同脱胎于其中的《符瑞志》《灵征志》始终都是中国历史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精英知识分子解释自然现象与历史事件的主要依据（张书豪，2017，p. 1）。<sup>①</sup>而在民间，五行灾异这套观念后来也广泛被《五行类应》与《五行类事占征验》等民间术数文本承袭，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汉书·五行志》出发，来讨论五行灾异这套符号解释传统是如何被建构的。

## 一、研究方法的目的

本文之所以选择《汉书·五行志》作为研究对象，理由大致有两点：首先，《汉书·五行志》是五行灾异思想的奠基性文本，此后历代《五行志》与《符瑞志》等类似文献基本上都以此为蓝本；其次，相比其他版本的《五行志》，《汉书·五行志》的文本结构最为完整，材料也最为丰富，很好地还原了这套解释传统的构建过程与组成元素。

严格来讲，《汉书·五行志》中的符号解释传统很早就已经被注意到，目前也有若干相关研究成果，比如陈侃理《〈洪范五行传〉与〈洪范〉灾异

---

<sup>①</sup> 《汉书·五行志》中的文献考证直到今天依然还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近些年也陆续出现了可观的成果。其中，张书豪教授于2017年出版的《汉书五行志疏证》一书对《汉书·五行志》进行了极其详尽的考辨疏证，其结论也翔实可靠。本文为节省篇幅，难以对所涉及的《汉书·五行志》词句一一考辨，所以基本上沿用此书的结论。对于张书豪教授的殷切鼓励与惠赠著作，本文在这里一并道谢。

论》，张书豪《汉书五行志疏证》。这些研究的价值很高，但其角度与方法主要聚焦于文献方面的考辨疏证。而就符号思想这个特定角度而言，这样的路径并不能算是最高效的方法。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雅柯布森的符指六要素为理论框架，并结合近年来西方关于古希腊等文明中的早期符号学的研究，来对《汉书·五行志》进行跨文化探讨。

雅柯布森的符指六要素虽然在中国影响极广，但不同汉语译本出入较大。为方便讨论并保持术语的统一性，本文结合近年来的相关汉语翻译，对雅柯布森关于六要素的诠释加以重新译述。

语言的研究必须要考虑其所有的功能。而要概括其功能，就需要对任何言语事件与语词交际行为中的构建因素做简要考察。其发送者（addresser）把信息（message）传送给接收者（addressee）。文本要得以运行，就必须有一个所指的对象（context），该对象要被接收者掌握，而其自身要么是言语形式，要么就是可以被言语化；符码（code）是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完全或者至少部分达成的共识；媒介（contact）是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一条物理渠道和心理联系，它使得双方能够保持沟通。<sup>①</sup>

上述文字可以用下图直观展示：



图1 雅柯布森符指六要素示意图

如图所示，符指六要素向我们完整传达了任何一次沟通或者交流所需要的必要条件。通过这样一个模型，我们可以有的放矢地对《汉书·五行志》四层文本的作用与功能做具体分析，看看这四层文本是怎么样组织、展示这六个要素，继而完成“天人感应”这样一个传播过程的。<sup>②</sup>

## 二、四层文本的分别讨论

《汉书·五行志》由四层文本重叠构成，即“经”“传”“说”和“事

---

<sup>①</sup> 原文参看 Jakobson & Rudy (1985, p. 113)，其中术语的汉语翻译以赵毅衡 (2012) 为参考，为保持行文简洁，上述译文没有保留雅柯布森原文括号中的附加信息。

<sup>②</sup> 《汉书·五行志》大致分为“五行”“五事”和“皇极传”三个部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五行”部分。为紧扣主题，本文基本上围绕着“五行”展开。

证”：“《五行志》先引‘经曰’一段，是《尚书·洪范》文；次引‘传曰’一段，是伏生《洪范五行传》文；又次引‘说曰’一段，是欧阳，大小夏侯等说，乃当时列于学官，博士所习者；以下则历引《春秋》及汉事以证之，所采皆董仲舒、刘向、歆父子说也。”（王鸣盛，2013，p. 148）

### （一）第一层文本：发送者

第一层文本明确传达的是发送者这一因素。《汉书·五行志》在开篇就传达出了这层含义：“《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班固，1962，p. 1315）。

上述引文清晰表明符号的发送者是天，而“天”之所以“垂象”与“见吉凶”，其目的是向人间传达自己的情绪。作为《汉书·五行志》思想的重要贡献者之一，董仲舒对灾异的诠释更为清晰地表达了这层关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苏舆，1992，p. 259）。

此外，这一层文本还揭示出天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彼此共通的符码，也就是伏羲和大禹从上天处得到的《河图》与《雒书》。这里虽然并没有交代其中的符码究竟是什么，但已经揭示了承载符码的文本及其来历，这些都是此后沟通能够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这种将信息发送者归于上天或者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做法，在其他文明当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Kim Beerden（2013，p. 107 - 138）就认为在人类早期的文明中，外部信息的导入主要是依靠占卜，而占卜所依据的符号往往都是来自超自然的力量。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当中也认为在巨大的灾祸降临之前，神往往都会先降下某种征兆（Hollmann，2011，p. 56）。

### （二）第二、三层文本：符码、媒介

在明确了发送者之后，第二层和第三层文本主要解释了其中的符码与媒介因素。其中，第二层文本是对符码与媒介的简要表述，而第三层文本则可

## □ 符号与传媒 (22)

以看作对第二层文本的进一步阐释说明。这两层文本关系相当紧密，本文在这里将其一并讨论。

第二层文本首先传递出了《汉书·五行志》这套符号系统的具体符码，认为如果统治者在执政中出现了某种过错，那么上天就会使五行中相应的物质失去本性，并以此作为警示：“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穡不成……传曰：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班固，1962，pp. 1318 - 1342）。

上述这五种以“If P, then Q”形式呈现的因果关系，便是天人之间交流的具体符码。这一套符码集合，便组成了《汉书·五行志》中关于五行灾异的元语言。

如果单独观察第二层文本，其中所表述的符码看上去就有些令人难以捉摸，比如说“田猎不宿”为什么会导导致“木不曲直”这样一个结果。而第三层文本则为我们解答了这一疑惑，那就是上述的原因与结果中存在着相似性的链条。正如艾柯（1997，pp. 53 - 55）所言，宇宙感应的观念都是有凭借的，即便是类似赫尔墨斯主义这样看上去神秘莫测的符指，背后往往都存在着某种或明或暗的相似性。

我们选取一例加以说明，这个例子所衔接的就是上面那一段引文：“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及木为变怪，是为木不曲直。”（班固，1962，pp. 1318 - 1319）

“木”在这里首先被解释为“地上之木”，然后又被解释为《易经》中的观卦，其背后的相似性为“坤下巽上，观。巽为木，古云地上之木也”（王先谦，2012，p. 1904）。接下来，观卦又被解释为统治者的“威仪容貌”。通过上面这两次推导，“木曰曲直”的本性就和统治者自身的威仪容貌产生了联系。在正常情况下，当统治者能够维护自己“可观”的威仪容貌时，木就维持其本性；当统治者做不到这一点时，木就会失去本来性状，其结果便是失去本性，变得形状怪异而难以加工。

除了阐明“木不曲直”背后的相似性推导，第三层文本对其他四组符码背后的逻辑也加以详细解说。相似性的建立往往都十分灵活，正如艾柯所说，“只要能够确立联系，用什么标准倒无关紧要”（1997，p. 55），《汉书·五行志》中另外几组符码所选取的路径也各不相同，并不完全是在儒家经典当中找寻依据，比如对“火不炎上”的诠释就主要来自直接的感官体验：“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乡明而治。《书》云：‘知人则愆，能官人。’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远四佞而放诸野。孔子曰：‘浸润之潜、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矣。’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适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灾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弗能救也，是为火不炎上。”（班固，1962，p. 1320）

这段材料以火本身能带来光明的属性为出发点，引申到帝王治理天下时也应该保持贤明。因此，如果出现了“信道不笃”“耀虚伪”等有悖贤明的做法，那么作为贤明象征的火就会失去本性而引发火灾。

在解释符码之间的逻辑关系之外，这两层文本也共同揭示了天人交流的媒介，也就是天人之间的感应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渠道被感知到的。简单来说，这其中的媒介便是“五行失性”所带来的各种灾异与变怪现象，也就是此前我们提到的“木不曲直”等变怪，我们在这里再做详细的说明。

五行中的五种物质，其本身属性都是可以为人所用的。《汉书·五行志》中曾引述了《尚书·洪范》来说明五行的原本属性：“经曰：‘初一为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班固，1962，p. 1318）

上述引文中“水曰润下”和“火曰炎上”相对来说都比较好理解，而其他三项可以借助王先谦辑录的注解略加解说：“木曰曲直”是指木头有被改变外形的属性，“可揉而曲，可矫而直”；“金曰从革”是指金属有可以被熔炼的属性，“革，更也，可更销铸也”；“土爰稼穡”是指土地有能生长农作物的属性，“种之曰稼，收之曰穡”。（2012，p. 1903）

在正常情况下，上述五种物质都会保持自身的特性，可以为人的衣食住行提供服务。而当统治者德行欠缺时，就会产生“木不曲直”“火不炎上”等“五行失性”的变怪。媒介本来就是为了被感知而存在的，“五行失性”这样的抽象的解说并不能充分地体现这一因素。而在第三层文本当中，我们则能清晰地看到“五行失性”的具体表现（表1）。

表1 “五行失性”的具体表现

木不曲直	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及木为变怪
火不炎上	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灾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弗能救也
稼穡不成	亡水旱之灾而草木百谷不孰
金不从革	盖工冶铸金铁，金铁冰滞涸坚，不成者众，及为变怪
水不润下	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穡

通过第三层文本的解说，“五行失性”的表现变得直观具体，基本上都是灾异变怪，比如水灾、火灾以及其他的怪异现象。这些现象无疑大大提升了“五行失性”这一媒介的可辨识度。

其他文明的早期符号学中也有“符号起于变怪”的认知。符号之所以常常以让人觉得怪异可怖的形象出现，是因为这样能够很快地被辨认出来 (Beerden, 2013, pp. 125 - 126)。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记录的符号往往都是一些灾害或者怪异现象，比如说地震、异兽、日食、突发的瘟疫等 (Hollmann, 2011, p. 51)。同样，古罗马文明把值得注意的符号分为四个种类：天上的自然现象，地上的自然现象，动物的行为以及人类的行为 (Rasmussen, 2003, pp. 53 - 116)。和《汉书·五行志》中各种灾异一样，这四种符号的具体表现往往也都是些怪异或少见的现象与事物，比如雷电、地震、毒蛇、怪兽以及畸形人等。总的来说，第二层和第三层文本共同揭示出元语言以及媒介。其中的元语言可以归纳为“如果人间统治者行为不端，就会引发‘五行失性’”这样一个“If P, then Q”模式，而媒介的具体表现则是“五行失性”所导致的灾异现象。

### (三) 第四层文本：信息、对象、接收者

第四层文本信息量最大，其主要内容便是将从春秋到汉代以来的种种灾异用此前的那套元语言系统加以试推。这一层文本包含了信息、对象以及接收者三个因素。为方便讨论，下文先引述两个典型例子加以讨论。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灾”。“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百姓伤者未瘳，怨咎未复，而君臣俱惰，内怠政事，外侮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廩以戒之。刘向以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桓不寤，与夫人俱会齐，夫人潜桓公于齐侯，齐侯杀桓公。刘歆以为御廩，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班固，

1962, p. 1321)

定公二年“五月，雉门及两观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皆奢僭过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诛季氏，又用其邪说，淫于女乐，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显而奢僭者。一曰，门阙，号令所由出也，今舍大圣而纵有罪，亡以出号令矣。《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班固，1962，p. 1329）

如果不考虑其中的推理过程，上面两个例子中的信息也可以用表2更加清晰直观地加以展示：

表2 “八月壬申，御廩灾”“五月，雉门及两观灾”两例第四层符号分析

信息（事件）	对象（事件原因）	接收者（解读者）
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灾”	[桓公] 君臣俱惰，非能保守宗庙（董仲舒） 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刘向） [桓公] 弃法度亡礼（刘歆）	董仲舒，刘向，刘歆
定公二年“五月，雉门及两观灾”	[定公] 奢僭过度（董仲舒，刘向） 君不思道（京房）	董仲舒，刘向，京房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再来对这三个要素加以审视。事件本身便是被传递的信息。这层文本在陈述事件之后，紧跟着便是以董仲舒、刘向等西汉儒家精英作为符号的接收者或者解读者，利用前面两层文本所构建的元语言对所引述事件外延意义加以试推，其对应的便是对象和接收者。所以，简单来看，第四层文本体现了五行灾异这套元语言的验证与运行。

当然，如果要论证五行灾异这套元语言的建立，仅仅通过单方面引述《汉书·五行志》本身的例证，似乎还不算中肯或有说服力，并且有陷入循环论证的风险。所以，本文也尝试选择其他角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五行灾异的驳难这种对立的论点，来证明五行灾异这套元语言在《汉书·五行志》当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接收与使用。在刘知几看来，《汉书·五行志》“芜累尤甚”。除了主观层面上的不满，刘知几也从事实层面对《汉书·五行志》提出了诘难。

一方面，刘知几观察到董仲舒、刘向等人对于同一个灾异现象往往见解不一，因此认为五行灾异说杂驳不纯：“且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双载其文，两存厥理。”（刘知几，1978，p. 66）

刘知几所言的“前后相反”与“父子不同”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这些



不同的理解并不能作为质疑五行灾异这套元语言的依据。如前文所引，在面  
对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灾”时，董仲舒认为这和桓公非能保守  
宗庙有关，刘向认为其原因是桓公夫人“有淫行，挟逆心”，而刘歆则认为  
是桓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的做法不合礼仪法度。这三种解读方式确  
实有所不同，但都一致认同桓公或者其夫人不合礼法的行为是灾异发生的原  
因，归根结底依然遵循了五行灾异元语言的底层逻辑。所以，这些不同的解  
读并不应该被当作相互矛盾的歧见，而是反映了解读者在能力元语言方面的  
区别。<sup>①</sup> 因为即便在认同相同元语言集合的前提下，不同解释者也完全有可能  
由于各自能力元语言的区别而选择不同元素搭配（赵毅衡，2012，  
p. 234）。

对此，《汉书·五行志》其实已经有过相关说明：“董仲舒治公羊春秋，  
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  
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  
（班固，1962，p. 1317）

所以，刘知几提出的“前后相反”“父子不同”的质疑使我们得以更为  
细致地观察不同解释者所使用的元语言，并最终发现这些看似不同的观点实  
际上在底层元语言的选择上达成了共识。

而另一方面，刘知几也观察到《汉书·五行志》所描述的十余处史实存  
在错误，并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略举一例加以说明：“《春秋》釐公二十九年  
秋，大雨雹。刘向以为釐公末年公子遂专权自恣，至于弑君，阴胁阳之象见。  
釐公不悟，遂后二年杀公子赤，立宣公。案遂之立宣杀子赤也，此乃文公末  
代。辄谓僖公暮年，世实悬殊，言何倒错？”（刘知几，1978，p. 559）

刘知几的质疑不可谓不中肯。但是平心而论，刘向、刘歆在当时都是饱  
学之士，按常理揣度并不应该如此频繁地犯这种类型的错误。在本文看来，  
这一类错误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刘向等人在使用五行灾异这套元语言的前  
提下，为了使其能够更好地解释符号文本，做出了必要调整。

这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一旦五行灾异这套元语言得以确立，那么任  
何相关的灾异都必须在其中获得相应的解释。如果某个灾异不能被这套元语

---

<sup>①</sup> 关于董仲舒是否严格使用过五行这套概念来解说灾异这个问题，目前依然有争议，但是这一  
争议并不会对本文的论证有实质影响。首先，本文所讨论的班固所编撰《汉书·五行志》并非严格  
意义的汉代学术史；其次，今人的文献考证虽然就董仲舒的学说提出了新的认识，但是客观上也无法  
完全还原当时的知识背景、学术文献以及班固本人的意图。因此，本文的讨论依然以《汉书·五行  
志》文本作为主要依据。

言解释，那么这套元语言的有效性必然会大打折扣。所以，在利用五行灾异来解释各种现象时，即便是存在某些年代或者史实上的出入，刘向等人也须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个结论，此时已经“不是符号文本要求相应的元语言来解释它，而是元语言强迫符号文本产生可解的意义”（赵毅衡，2012，pp. 227 - 228）。明白这一层关系后，前面那些在刘知几看来难以接受的不足，实际上很可能正是刘向、刘歆等人为了使所有灾异符号文本都能够被五行灾异这套元语言合理解释而做出的一些必要调整。这样一些折中的“不足之解”却很忠实地证明了五行灾异这套元语言的强大。

所以，刘知几为批判五行灾异而提出的诘难反而成了对五行灾异元语言的构建、接收与有效运转的极佳注解，客观上论证了五行灾异这套元语言的根深蒂固与深入人心。

在西方的符号学传统中也有和《汉书·五行志》第四层文本类似的书写。Rasmussen (2003, pp. 35 - 36) 就注意到古罗马的占卜家所记录的符号解读案例一共分为六个要素，即文献来源 (literary sources)、年代 (chronology)、地点以及时间 (geographical locations and incidents)、事件内容 (substance of the events reported)、祭司解读 (priesthood involved)、救赎方式 (expiations prescribed)。这样的排列和《汉书·五行志》的处理方式极其相似，所包含的也同样是信息、对象和接收者。

### 三、结论

综上，本文借助雅柯布森的符指六要素，逐一研究《汉书·五行志》中的四层文本，分别探讨每层文本中的符指要素，以揭示这套元语言及符号解释范式是如何建构并正常运转的。同时，本文也借助了近年来关于其他文明早期符号学的相关研究，以讨论中国古典符号学思想中的共性与个性，试图为中国古代符号学带来更多可借鉴的角度与参照。就五行灾异而言，其背后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比如说符指六要素分别所对应的功能表现，欧阳修、王安石等宋儒试图通过怎样的途径来消解这套元语言，等等。本文只能算作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讨论。

#### 引用文献：

艾柯，翁贝托 (1997). 诠释与过度诠释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 符号与传媒 (22)

- 班固 (1962). 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 刘知几 (1978). 史通通释 (浦起龙, 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苏舆 (1992). 春秋繁露义证.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鸣盛 (2013). 十七史商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先谦 (2012). 汉书补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张书豪 (2017). 汉书五行志疏证. 台北: 学生书局.
- 赵毅衡 (2012).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Beerden, K. (2013). *Worlds Full of Signs: Ancient Greek Divination in Context* (Religions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V. 176). Leiden: Brill.
- Hollmann, A. (2011). *The Master of Signs: Sig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igns in Herodotus' Histories* (Hellenic Studies, 48). Washington, DC; Cambridge, Mass.; London: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akobson, R., & Rudy, S. (1985). *Selected Writings 7, Contributions to Comparative Mythology; 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1972 - 1982* (Selected Writings / Roman Jakobson, V. 7). Berlin, New York: Mouton.
- Rasmussen, S. (2003). *Public Portents in Republican Rome* (Analecta Romana Instituti Danici. Supplementum, V. 34). Rome: L'Erma di Bretschneider.

### 作者简介:

兰兴, 爱丁堡大学中国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符号学、阐释学、文献学。

### Author:

Lan Xing, Ph. D. candid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semiotics, hermeneutics and philology.

Email: lxgoalsky@gmail.com